

人为何丢失了「经验」

——读阿甘本

李荣

欧陆在世的哲人当中，意大利的阿甘本是活跃而且思想深刻的一位。我知道这个名字，是有一次在书店里看到《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拿起来翻了一下，没有想到马上就给吸引住了，不知不觉之间已经飞快地翻过了小半本。回过头来看一看书的封面，著者即是阿甘本，便把这个名字记住了。

这一册书，也是阿甘本的代表作，里面说我们的这一个时代，是一个经验毁灭的时代，那些属于个体自己的“经验”已经找寻不到，我们所有的，都只是在个体之外的化约为“工具与数字”的“标准的真理”。

阿甘本认为现代人没有能力拥有和交流经验，这个思想或起之于本雅明有关一战之后人们表现出的“经验贫乏”现象的一段话：“人们归来……可交流的直接经验不那么丰富反而更贫乏了……出版的战争书籍中应有尽有，但却没有人们口头流传的经验。”

本雅明的这段话，与记得好像是海明威说过的一段话也有点相似的地方。海氏说，有一些亲身参加了一战的士兵却好像是根本没有到过战场一样，而那些没有沾上什么硝烟的油滑士兵，借着报刊和杂志上的描写，却是说尽了战场上的“实感”。我们已经得不到经验，经验毁灭了。

阿甘本由本雅明的那段话说到如今，经验的毁灭早已不是像一战这样的巨大灾难的后果了，任何城市单调的日常生活都足以致之。他的原话是这样：

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再也没有可以转化为经验的东西了。翻开报纸，那目不暇接的新闻与他的生活毫不相干；在交通堵塞时，他坐在车中无限期地等待；商场柜台前长长的人流；超市中让人流连忘返的乐土；电梯和公车里夹杂在陌生人中间那永恒的沉默时刻，所有这些都不是现代人的经验了。现代人晚上回归家门，杂七杂八的事情已经把他搞得疲惫不堪，但这些事情娱乐也好，单调也好，特殊也好，寻常也好，苦恼也好，愉快也好，没有一件是可以变成经验的。

正是这种不可转化为经验的事实，使得日常生活前所未有地无法忍受，而不是所谓的生活质量低下或相比过去缺乏意义造成的。相反，日常生活中或许从未像现在发生如此意义丰富的众多事件。

阿甘本由此想到了十九世纪文学中的日常压抑的表达以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有关日常生活之“平庸”的著名论断。阿氏认为，经验的毁灭如果追溯起来，或在现代科学创建之始即“隐身”其中。在西洋古代，经验与知识尚是并行而不悖，经验属于个体，而知识则是属于全体，或者可说是一与多、人与神、地与天之关系也。经验属于个体，个体总是一个有限的过程，有生与死，这个换种说法也就是能够走完一条完整的路，所以经验是既能够经历也能够拥有。而知识却属于所谓“无涯者”，总没有一个完整的时候，如何能够拥有呢？

到了现代科学创制，从法哲笛卡尔及英哲培根开始，都是对于传统经验的毁灭如果追溯起来，知识把经验毁灭了。阿甘本认为，现代科学亦言经验，却是偷偷把传统经验换成了

的古意，和后来演变出的曲水流觞、踏青游春等风尚，正如《荆楚岁时记》在“取鼠麴汁……”之前记：“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现在才喜悉，除了这类已熟知的赏心乐事，原来还有制食鼠麴汁龙舌料、青艾饼的古风。这也对的，上已的起源是洗垢消灾，人们要用香蕲草药沐浴；而鼠麴草或艾草，可入药治疗肺炎等，且有香味，正可兼辟邪之效。——《荆楚岁时记》记述的古荆楚地区，即湖北，正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借此也祝愿可如鼠麴草之“压时气”（驱镇时疫），早日祛除疫病。

最后，是与名称有关的。“镇疫草”只是我给起的名字，至于正名鼠麴草，“鼠”字当如前面说过的、形容其叶如鼠耳；“麴”，李时珍《本草纲目》解释，是指“其花黄如麴色”。麴（曲）乃麦、豆等制来酿酒或做酱的发酵物，上面长着灰土般的真菌。古人似乎颇看重此物此色，衍生了“麴尘”等词，因此用来命名这种黄花草，应是出于喜悦的心情。

上面还谈过鼠麴草的一些别名，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在《太平广记》读到的一则“无心草”，说：“虬蜉酒草，一曰鼠耳，象形也。亦曰无心草。”该条出自《酉阳杂俎》，许逸民《酉阳杂俎校笺》注释说即鼠麴草。

《本草纲目》也引用了这则记载，猜测可能是“虬蜉食此，故有此名”。不过，虬蜉酒草一名中还有个“酒”字，我想大概亦由麴延伸而来；虬蜉是大蚁，它们吃鼠麴草，让人联想到形如蚂蚁的洒上浮滓泡沫（白居易“绿蚁新醅酒”便是这种“酒蚁”）。至于无心草，李时珍没有说明，不知典出为何。但《太平御览》引三国魏时张揖撰《广雅》：“无心，鼠耳也。”可见此名起源很早。

“无心”，这个词让我低回。“于心无事，于事无心。”既高迈圆融又虚空倦慵。“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唐李益《写情》）惆怅至极的决绝。而拜网络搜索之便，查到我今天主题来的重点人物苏轼，也多次写过“无心”，当中不少源出于他服膺的陶渊明之《归去来辞》“云无心而出岫”，表达类似的出处心境，如《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望云楼》：“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等等。此外《送范景仁游洛中》：“得酒相逢乐，无心遇所安。”反映了苏东坡的重视友情、豁达乐天、随遇而安。这两句诗正好将虬蜉酒草与无心草二名结合在一起了。是啊，天地不仁，人如蝼蚁，但正因此才要互相珍视而勿彼此伤害（老友李兄的意思）；世事纷扰，无非麴尘，但正因此对再糟糕的遭遇亦可蔑视之而自乐自安。聊尽杯中物（忽想起曾在武汉喝过很畅快的酒……），无心且去来。

——行文至此，前线疫情依然严峻，说这些话，进而包括写这些花草小情趣，似乎有点远离现实而无心无肝了。然而，我在鼠年读的第一本书、E·B·怀特的《精灵鼠小弟》，有段对话印象深刻：“你先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阴暗下午到过头来出现的一束阳光，音乐的一个音符，一个小宝宝脖子后面的香味……”是的，在生死大役之外、在各尽职责之余，对这样的日常美好点滴，同样应该看重。就像鼠麴草，不无悲凉气息，除了曾相伴宋徽宗的清明涕泪，还有它制作的黄花麦果糕，如周作人所记，是用作清明扫墓祭祀；然而，这些青团在供奉死者时，亦供人们分享，且像《证类本草》等说的：“食之甜美。”这是一个很好的象征，是面对死亡阴影的生活姿态。什么是重要的？也许就包括心系防疫的同时，仍可以无所系心于苦涩、而守护一点点家常的甜美吧。

2020年2月8日、元宵节，新年启笔；
2月19日、雨水节气，重温自己昔年游鄂的书籍、游记、照片（原来很多美妙的花草，都是在湖北及武汉首次认识的），完成初稿；

鼠年正月收结的2月22日，修订二稿——是日偶然发现，阳台花盆竟然野生了几棵鼠麴草，此乃首度飞来我家，恰好佐我此文，岂非天意哉。



笔会

青花

（油画）

韦清泉

属于芭蕉、香蕉的另一种植物。他描述此花：“叶瘦类芦笋，中心抽条，条端发花……色正红，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点鲜绿，尤可爱。春夏开，至岁寒犹芳。”胡起望等《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说，这是美人蕉，并引宋人宋祁《益都方物略记》、明人王象晋《群芳谱》等为证，还指出在宋代已植为观赏花卉。

许逸民的《酉阳杂俎校笺》，也引了范成大的记载来注解那些红蝙蝠聚焦的红蕉，说俗称美人蕉。还有，范成大的部下周去非仿照《桂海虞衡志》撰写的《岭外代答》，基本袭用了前者的红蕉花内容，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亦云，此即美人蕉。

真正的红蕉是美人蕉，已成定论。它属于美人蕉科，与芭蕉科的芭蕉、香蕉其实很不相同，没有后者那么身高大叶，更没有可食用的蕉果，但同样是受人喜爱的园林植物，形态美，花朵大，花色艳（不限于正红，还有浅红、黄、橙等），花期长，至今都常见用作绿化栽培。——十余年前我游湖北，在这次新冠肺炎的起源地武汉，买过真柏著《花花草草的七情六欲》，里面美人蕉一篇指出其“花色俱靓，茎叶俱美”；花朵夺目，火热燃烧，枝叶也动人，“宽厚大方”；并盛赞其随处可生的适应性，能净化有害空气和污染水体。当此疫中，读这样的记述别有趣味。

再说红蕉与芭蕉之辨。陈非等著《唐诗花园》，在同类书中难得地将两者区别开来，分两章介绍相对应的唐诗。确实，原产热带的红蕉，在唐代就已为来到南方的文人瞩目，柳宗元、李绅、徐凝、韩偓等都留下过专题诗文，我去年写的《大唐两广，草木三生》已谈到过，不多赘言，但要再次转引薛爱华《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的一句话：“红蕉在古代诗词中备受赞美，它与这片朱雀的领土相得益彰。”——该书独到地指出，岭南以其自然环境，色彩主调是红，特有的红色花卉和果实最能代表当地本质。

这“绿罗从里著朱衣”（宋人胡用庄《咏红蕉》）的花间，还生活着红色的飞鼠，一静一动红中红，更有耀眼。而古代绘画、瓷器中常出现红色蝙蝠，寓意“洪福”。然则，如果我们不将疫情迁怒于蝙蝠的话，新年记此，亦为红彤彤的吉利喜庆。

另外，美人蕉一名也给这个意象增添了韵味。该名称从前引《群芳谱》可知，自明代起已出现。（另于雷寅威等编选《中国历代百花诗选》检得，确是最早在明朝有皇甫汈等人赋咏《题美人蕉》。又明人高濂《遵生八笺》记“红蕉花二种”，谓：“种自东粤来者，名美人蕉。”）也许因为叶子与芭蕉相似，人们用“蕉”命名、甚至视为蕉的一种；而因花朵的艳丽、姿态的曼妙，遂被以“美人”为喻。——如真柏说的，美人蕉之名“妩媚而亲切”，它“也的确不虚此名”。而红飞鼠在美人之花中痴情相依，真是可爱的图景了。

所以，这美人红蕉堪称鼠之情花。——本文标题的“鼠情花”，便是此意。另一小敬意，是冀以花事“抒情”。这个庚子鼠年，董桥所书的挥春有“鼠”之谐音的吉祥语：“舒心”。惟愿我们在紧张应对疫情之余，也能得些舒心舒缓，抒情抒怀。

青团黄酒鼠麴草

“太平本草”等书还记录了不少与鼠同名的植物，这里选谈一种有典故、有韵味、且身边就有的：鼠麴草（也作鼠曲草，麴通曲）。

此草作为药物首载于唐人陈藏器《本草拾遗》，经宋代张禹锡等《嘉祐本草》、特别是唐慎微《证类本草》引用而保存下来的内容，主要有：“叶有白毛，黄花”，可用来染色，又名鼠耳草；入药去咳除痰、“调中益气”，还能食用：“杂米粉作糍（按：干饭或米糊），食之甜美”；就此引《荆楚岁时记》：“三月三日取鼠麴汁，蜜和为粉，谓之龙舌料（按：同板，米制糕饼），以压（按：原文为‘仄’，义相同）时气。”以下就由此分述鼠麴草的种种。

首先，与形态有关的。《太平御览》引西晋郭义恭《广志》：“鼠耳，叶如耳，缥色也。”这是指叶子形状像老鼠耳朵，长着白毛而呈现青中泛白的颜色。李时珍《本草纲目》介绍，因为鼠麴草这“白茸如鼠耳之毛”，在北方还有个别名茸母，他引了宋徽宗一句诗：“茸母初生禁焚烟。”——赵佶被金兵掳至蛮荒北地后的这首《清明日作》，写他在那祭祖追远的特别日子，遥望中土乡关、回忆帝城春色，直抒国破家亡的凄然；鼠麴草，独立于全诗开篇处，以幽微之身见证着亡国之君的故都之思，见证着文艺天子被困禁异域至死的悲苦命运。

不过，鼠麴草属植物虽然分布广泛，在中国北方也有，但据那福武等主编《东莞植物志》，其主要产地是我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综合此志以及我昔年湖北旅行的背景书、中科院武汉植物研

庚子新年以来，“太平草木”开春：读一点北宋“太平三书”（太平兴国年间全面编辑前代文献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以及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和宋代崇医背景下涌现的多部本草名著。这是因今年的个人读书主题顺延至宋朝，也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肆虐之时，以吉祥书名和药物内容作为祛灾祝福。

这些巨著繁富浩博，我只选览了应合年时的动植物部分，重点是寻觅鼠年草木典故。虽然，关于鼠向来没什么好话，即使与植物的关系亦然，如《诗经》名句“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老鼠与民争粮，从一开始便是人与庄稼的对立面。但“鼠”与“书”、“树”谐音，故在书中缀绘一些相关花草，亦为宜焉。

美人蕉间痴情鼠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的鼠之卷，收录了历代不少负面故事（如人对鼠的一贯印象）和正面记载（如鼠报恩救人、鼠助人富贵、见鼠舞为吉兆），最让我注目的是以下一例：

红飞鼠，多出交趾及广管陵（洺）州，皆有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浅黑色。多双伏红蕉花间，采捕者若获一，则其一不去。南中妇人，买而带之，以为媚药。

——在岭南的红蕉花中，栖息着成双成对的红色飞鼠，它们相伴甚笃，如果一只被人捉走，另一只决不肯离去，人们视之为情爱象征，迷信的女人把它们当作可吸引异性的迷药、像饰物一样买来佩戴。这情景颇为诡异，却也诡丽，那红艳花间相爱相守的红飞鼠，是很有情味的意象。

该条是转载唐末在广州任官、定居的刘恂所撰《岭表录异》。我因之去查原书，却另有发现：商璧等《岭表异校补》的注释中说，这写的是蝙蝠，土语称为飞鼠。

再牵连读相关书。刘恂之前不久也在广州做官的段公路写过《北户录》，已有类似记载，所述与《岭表录异》略有出入，但明确说是“红蝙蝠”，并点出其“背深红色”。更早一些，段成式《酉阳杂俎》便有“红蝙蝠”条，引用别人对他讲述：“南中红蕉，花时有红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蝙蝠。”这似乎是最早的出处，看来属于唐代广为传播的岭南趣闻，而段公路、刘恂以亲身入粤的经历，对此一再深入细化记述。

综合以上资料，红飞鼠原来即红蝙蝠。事实上，鼠和蝙蝠因为形似，常被联系在一起，同出于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引古书谓：“百岁之鼠化为蝙蝠。”而让人不堪的是，这次新冠肺炎的源头，很可能就是蝙蝠。

只是，蝙蝠虽身携多种病毒，原本自幽居深山洞穴，无碍于人，是人类扰乱自然环境、进食被其传染的野生动物（乃至吃蝙蝠本尊，《北户录》便有记载，称“其肉甚美”，食之可长寿成仙；苏轼诗《闻子由瘦》，也说他南贬期间所食有“薰鼠烧蝙蝠”），以此陋习，才染病而成疫灾的，不能怪到蝙蝠头上。对此，老友罗生开玩笑说：红飞鼠因人类捕杀失去伴侣，失恋之后伤心过度，迷失了自我，情绪失控遂成“鼠疫”了。另一方面，蝠与“福”同音，在传统中本是吉祥物，古画有钟馗蝙蝠图，乃驱鬼纳福之象。故此，鼠年在书中遇到这痴情鼠，也可算是以读解毒。

红飞鼠的传奇从唐到宋一直流传，除了《太平广记》引用《岭表录异》，钱易《南部新书》也将《酉阳杂俎》那几句话稍为改动收入：“南中红蕉花，色红，有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蝠。”——请注意，这前一（《酉阳杂俎》）一后（《南部新书》）两处，视角是首先落在红蕉花上的，不像中间的《北户录》《岭表录异》《太平广记》，从飞鼠蝙蝠说起、以之为主角。是的，这个故事还有一个重要元素，即红飞鼠寄居的红蕉，以此才构成美艳画面。

关于红蕉，宋代从苏颂的《本草图经》到陈景沂的《全芳备祖》等草木专著，都陈陈相因地提到：甘蕉（即香蕉）中花色“红者如火炬，谓之红蕉”。但这似乎只是一种蕉的别名，并非通常作为独立名称的红蕉。乐史《太平寰宇记》的“岭南道”记各地土产，其中梅州有山蕉，昭州（今桂林一带）则有红蕉，但亦语焉不详。

对此，另一位宋人范成大给出了答案。他曾执掌广西军政，通过桂林的实地调查和见闻写成的《桂海虞衡志》，当中各种“蕉子”之外，还有一则“红蕉花”，即是不